

從經濟層面看中共和蘇聯關係

尹慶耀

一九六〇年可稱爲中蘇共黨公開分裂的一年，同年六月十七日蘇聯通知中央，要在一個月內撤退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蘇聯專家，當時中共企圖挽留而不可得。同月廿日至廿五日羅馬尼亞工人黨舉行第三次大會（嗣後恢復共產黨名稱，大會次數亦重新計算），黑魯曉夫於廿一日演說中，抨擊中共爲教條主義，並散發長達八十頁的小冊子批判中共。事後中共指此爲突然襲擊。中共出席此次大會的代表團長爲彭真，他匆忙準備了一份書面聲明，在廿六日舉行的「兄弟黨」會議中散發，斥責黑魯曉夫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創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並曾與黑魯曉夫拍桌對罵。同年十一月劉少奇率團赴蘇，出席八十一國共黨會議。會中鄧小平以四小時半時間，宣讀長達一八〇頁的冗長報告，說明中共立場。在會議「聲明」發表（十二月五日）之前，由於中蘇共黨的爭執，草案經過三百次修正之後始達成協議。雙方公開分裂，已爲世界所公認。彼此間的經濟關係，當然大受影響。

蘇聯對於早期給予中共的援助，不斷反覆鼓吹。直到最近，蘇聯還聲言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現，是依靠蘇聯的廣泛和全面支持。它說，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一日，蘇聯和中共在莫斯科簽訂了幫助中共擴建現有的電站和建設新電站的協定，同年五月十五日簽訂了蘇聯幫助中共興建和改建一四一個工業企業的蘇「中」協定，這些企業後來成了中共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其中有冶金、採煤、煉油、機器製造、汽車製造和拖拉機製造等廠礦企業以及電站。一九五四年十月、一九五六年四月又簽訂協定，蘇聯幫助中共擴建一五個工業企業和五五個補充項目，其中有冶金、電機製造、人造纖維、合成材料、無線電器材工業等企業以及大型電站等。這個時期，在中共的工業基本投資中，蘇聯的實際參與額大約佔百分之四十四。蘇聯真誠的想幫助「中國」勞動人民順利地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蘇援工業項目時，採用了最新的生產方法，最現代化的設備。蘇援企業在一九五七年大約生

產中共鋼和煤的一半，全部電力的百分之十五以上。第一個五年計劃年代裏，中共的工業部門依靠蘇聯的幫助，試製成功過去中共無法製造的新產品，光是重工業部門就試製成功四、五三二種新產品，而三年恢復時期（一九五〇—五二年）中，也試製成功了八六〇種新產品。中共工業試製成功了二〇〇種新式金屬切削機床、高爐和平爐設備、鑽探裝置和挖土機等現代化機器。「中國」的工業產量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一點四倍，比一九四九年增長了四倍多。同時，建立了現代化國防工業包括飛機、坦克和大砲的製造廠等等。兩「國」的科技合作也曾順利發展，中共按照蘇聯提供的技術資料，不僅開始生產很多種工業品，而且設計了幾十個工業企業。獨一無二的蘇聯科學設備和裝置曾經運到「中國」，在蘇聯的幫助下，建起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第一座原子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①。

中共對於類似上引的蘇聯宣傳很少反駁，但對於蘇聯停援則頗有椎心泣血之痛。中共曾經指摘蘇聯說：「你們應當記得，在蘇共領導片面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之後，我們曾經鄭重表示，願意挽留蘇聯專家繼續在中國工作，希望蘇共領導重新考慮和改變自己的決定。但是，你們却不顧我們的反對，背棄了國際關係的準則，在一個月的短時期內，悍然撤走了在中國幫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蘇聯專家，撕毀了三百四十三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二百五十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②。

一九六〇年當時，中共正值「大躍進」失敗之後及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蘇聯此舉，是一項經濟制裁，對中共的打擊是極其嚴重的。因此，中共沉痛地說：「你們清楚的知道，蘇聯專家分布在我國經濟、國防、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等部門的二百五十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在技術設計，工程施工，設備安裝，產品試製和科學研究等方面擔負着重要的任務。你們強迫蘇聯專家中斷自己的工作，撤回蘇聯，使我國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學研究項目被迫半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入生產。你們這種背信棄義的行動，破壞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原定計劃，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巨大的損失。在中國遭到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時候，你們乘人之危，採取這樣嚴重的步驟，完全違背了共產主義的道德」^③。

註① (一)莫斯科廣播電臺「華語廣播談話「蘇聯對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貢獻」，乃「蘇中關係史片斷」連續談話之一部分（一九八二年四月廿三日播出）；(二)請與本刊第廿一卷第十期拙作「關於蘇聯對中共的經技援助問題」中所引資料互相參照；(三)依一九七七年四月廿七日華語廣播談話稱：一九五五年蘇聯向中共建議，願幫助設計、供應設備和建設實驗性原子能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同年三月卅一日中共「國務院」決議指出，蘇聯決定幫助中共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核子物理研究和和平利用原子能，這是蘇聯和平的對外政策的光榮表現，是鞏固「中」蘇偉大友誼的新貢獻。四月廿七日簽訂協定，蘇聯幫助中共設計、提供設備和建設第一個原子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第一個原子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建成投產。

註②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人民日報」（同年五月九日）。

註③ 同註②。

對於撤援一事，蘇聯方面另有說法。它指稱在「大躍進」期，中共的「民族主義」（在共黨術語中，它意味着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大國情緒」日漸增長，對蘇聯專家輕慢的態度也日趨明顯。自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中共各企業、各部、各機關的工作幹部，對待在大陸工作的專家的態度急劇惡化。同一年，中共領導提出「反對盲目信仰外國技術經驗的標準與權威」、「反對保守主義」等口號，實際上反對利用蘇聯經驗和蘇聯專家，拒絕確立技術與工藝文件所規定的嚴格標準的要求。各工業企業於同年第三至第四季度撤銷了所有的技術服務（工藝科、主要化學科、主要動力科、技術管制科），還撤除了工作位置上所必需的說明與須知。蘇聯專家的建議不被採納，有些人員交往的計劃也被取消^④。另有的說法是，當時中共禁止蘇聯專家進入人民公社。如此說來，蘇聯撤退專家，也就成爲理所當然了。

不過，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中共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仍然提到「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⑤。

對於中共的此項指摘，蘇聯辯稱：一九六〇年，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政策使全「中國」陷入了空前的饑荒，此時，蘇聯不僅同意中共所提暫停按一九六〇年的貿易協定所應供應的食品，並且聲明，一九六一年也不向中共購買食品。與此同時，蘇聯政府建議借給中共一〇〇萬噸糧食和五〇萬噸白糖，蘇聯同意把中共債務的償付期限延長五年。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爲止，中共的債務達數億盧布。六中全會的決議說，這筆債務主要是「抗美援朝」時，由於蘇聯供應軍備欠下來的^⑥。蘇聯說，實際上，中共由於蘇聯供應武器所欠的債務，只等於總數的很小一部分，蘇聯的絕大部分貸款，是爲在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援助建設一五六個關鍵性的工業項目而提供的。至於縮減經濟聯繫和召回蘇聯專家的問題，完全是根據中共方面的倡議而進行的。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蘇「中」兩國舉行會談時，「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顧卓新^⑦曾正式聲明：（一）感謝蘇聯援助中共建成了現代化的工業和技術基礎。今後大多數項目的建設和設計，將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二）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認爲，必須集中力量，建

註④ 參閱鮑里索夫、柯洛斯科夫合著、彭士譯譯《蘇中關係》，二三—二七頁。

註⑤ 《新華社》北平（一九八一年六月卅日）電。

註⑥ 按決議原文爲「……對外頂住了蘇聯領導集團的壓力，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債款）……」。

註⑦ 當時，顧卓新任中共「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設重點項目，縮減基建項目。結果，由於中共方面的主動，一九六一年蘇聯向中共供應的成套設備，比一九六〇年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中國」政府聲明，停止從蘇聯進口一切成套設備。與此同時，中共領導大大縮減了蘇「中」兩國在其他領域的合作聯繫^⑧。

關於雙方的債務問題，中蘇共也各有不同的說法。

蘇聯說，它對中共提供的一八億一、六〇〇萬新盧布貸款，韓戰中所供給的，僅佔總額的四分之一。而且，到一九六一年初所剩債務二億八、八〇〇萬新盧布之一部，蘇聯允予無息延期五年償還。到一九六三年爲止，中共支付的黃金、現款，僅佔蘇聯對中共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以一九六〇年爲例，中共向蘇聯輸出的貨物中，食品類佔百分之二〇，它在中共食品生產總量中所佔比率，計米爲百分之〇·五、植物油百分之二·七、肉類和肉製品百分之三弱，這對中國人民生活並不構成壓迫^⑨。

中共說：「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對於蘇聯向我國提供的所有成套設備和物資，包括通過貸款形式提供的設備和物資，連同利息在內，我們都是用物資、黃金和國際貨幣償付的。還應當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來說，是貴得多的」。又說：「到一九六二年底爲止，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糧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億新盧布，其中重要的有：大豆五百七十六萬噸，大米二百九十四萬噸，食用植物油一百零九萬噸，肉類九十萬噸等等。在同時期內，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礦產品和五金值十四億多新盧布，其中重要的有：鋰砂十萬噸，鈹砂三萬四千噸，硼砂五萬一千噸，鎢砂二十七萬噸，壓電石英三十二點九噸，水銀七千七百三十噸，鉍砂三十九噸，鉬砂三萬七千噸，錫十八萬噸等等。這些礦產中，有許多都是發展尖端科學，製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⑩。

蘇聯債款的償還，正值大陸經濟極端困難時期，中共乃不得不令人民束緊腰帶，從事饑餓輸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第三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時，周恩來報告說：「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布，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香港「大公報」報導，中共「貿易促進會」副主席勇龍桂對港澳記者稱：「欠蘇聯債款共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每〇·九新盧布合一美元，已於本年一月三十日全部還清」。

註⑧ 以上蘇方說詞，見《莫斯科廣播電臺》（一九八一年八月廿三日）廣播評論。

註⑨ 轉自草野文男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日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廿日初版），七二頁。

註⑩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原載《人民日報》（同年五月九日）。

中共和蘇聯經濟關係的變化，在雙方貿易上清晰地反映了出來。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中共和蘇聯簽訂的貿易協定第四條，規定貿易貨物價格「按世界市場價格之基礎規定以盧布計算之」。當時中共的「人民幣」與盧布比價爲一對二，一九五七年葉季壯在「人代會」報告時稱，此項原則七年不變。然而，實際却是有變化的。首先，雙方貨幣的貿易匯率，至少在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三年以降，已變成一對一，雖無公開資料，但可推算得出來。這當然對中共不利。價格決定也有了變化，從個別商品看來，中共輸出農產品價格不利，礦產品較接近國際市場價格，但輸入蘇製機械則價格偏高，石油價格比較穩定。與蘇聯對不結盟國家貿易價格相比，蘇聯對中共貿易確有賤買貴賣的事實^⑩。

然而雙方貿易額則迅速增長，一九五二年以降，中共對蘇聯貿易持續地佔其輸出入總額百分之五〇左右，如果連同對其他共黨國家貿易合併計算，則一九五九年已佔其貿易總額百分之七四·三。一九五九年中對蘇貿易總值一八億四、九四〇萬盧布（二〇億五、四八〇萬美元，所列爲新盧布——下同。），佔中共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七·二。不過，那已是最高峯，逾此就急劇下降了。其原因固與中共「大躍進」及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有關，但雙方關係惡化，更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一九六〇年雙方貿易額爲一四億九、八七〇萬盧布（一六億六、五二〇萬美元），當年的百分之八一，亦即約減百分之二〇；一九六一年八億二、六九〇萬盧布（九億一、八七〇萬美元），當年的百分之五五，即減百分之四五；一九六二年六億七、四八〇萬盧布（七億四、九七〇萬美元），當年的百分之八一·六，即約減百分之二〇；一九六三年爲五億四、〇二〇萬盧布（六億二〇萬美元）；一九六四年爲四億四六〇萬盧布（四億四、九八〇萬美元）；一九六五年爲三億七、五五〇萬盧布（四億一、七一〇萬美元）。到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〇年，更分別銳減至五、一一〇萬盧布（五、六八〇萬美元）與四、一九〇萬盧布（四、六六〇萬美元）。與一九五九年貿易額相比，分別爲百分之二·八與百分之二·二^⑪。

進入七〇年代，中共與蘇聯之間的貿易額最初三年降至極低，其後較穩且有微弱上升傾向，而且一直持續。一九八〇年略低，爲三億一、六六〇萬盧布，一九八一年又經跌落，至一九八二年又大幅提升。其推移如左表：

附表 中共、蘇聯貿易推移（單位：百萬盧布）

年 度	總 額	中共進口	中共出口
一九七四	二二三·九	一〇八·四	一〇五·五
一九七五	二〇〇·六	九二·八	一〇七·八

註⑩ 參閱〔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六九一七一頁。

註⑪ 百分比請參閱〔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七一頁。因其絕對數字（盧布額）不全，故改用廣瀨一：「中共、蘇聯貿易的推移」一文中數字，臺北，〔中國大陸〕第九四號（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二三頁。

一九七六	三一四·四	一七九·八	一三四·六
一九七七	二四八·五	一一八·四	一三〇·一
一九七八	三三八·七	一六三·六	一七四·一
一九七九	三四七·九	一九〇·六	一五七·三
一九八〇	三二六·六	一四七·〇	一六九·六
一九八一	一七六·八	九四·二	八二·六

資料來源：各年度蘇聯對外貿易統計年鑑

一九八〇、八一年貿易額的減少，或與蘇聯入侵阿富汗有關。一九八二年雙方貿易談判循例於三月初開始，蘇聯所提希望輸出的主要商品為機械、木材、直昇機、汽車、鋼鐵等；中共希望輸出的主要商品為輕工業品、日用雜貨等。最後，中共拒絕購入蘇製機械而應允輸入西伯利亞的木材和二百部汽車。貿易總額為六億瑞士法郎，約三億美元，與一九八〇年之貿易額接近。最初中共希望較一九八一年貿易增高百分之百，結果僅增百分之四五。一九八二年度貿易協定，係於布里茲涅夫塔什干演說呼籲改善「中」蘇關係之後，於四月十六日在北平簽字，同時承認邊界居民之間的貿易。按雙方關係惡化前，曾有六處從事邊界交易，今後開放若干處所不詳^⑬。又根據較早資料，近年來中共除向蘇聯購置飛機、汽車、有色金屬之外，也購買過能源及燃料有關的機器設備。

四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共黨政權，它的政治、經濟模式常為後起的共黨政權所模倣，而中共更有過一個學習蘇聯的時期和運動。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澤東曾指令全「國」展開學習蘇聯的運動。同年四月廿三日，中共從「聯共（布）黨史」中有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如一九二一至二五年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一九二六至二九年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一九三〇至三四年為農業集體化時期，一九三五至三七年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確立、新憲法的採擇時期，摘錄其菁華，作為幹部必讀的學習資料。中共的目的在學習蘇聯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及其先進的科學技術，俾能使自己在建設途中儘可能減少錯誤與無意義的迂迴曲折^⑭。在當時，「以俄為師」、「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等等口號，是響徹雲霄的。因

註^⑬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七面。

註^⑭ 參閱《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二六頁。

此，當時中共的工業設備和整個經濟體制，都是蘇製和蘇式的。

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可要約爲：公有公營、中央計劃、命令經濟、集權的管理制度、公定物價、重工業優先等特點。中共經濟建設之初，對蘇聯亦步亦趨，完全照抄。一九五八年實行「人民公社」後，與蘇聯漸有差異。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反對專家治廠、打擊「唯生產力論」、批判「洋奴哲學」等等影響下，蘇式經濟體制也受到一些衝擊，而「政治掛帥」、黨委領導的強調，更造成黨委書記一人獨裁，外行領導內行。然而，受過蘇聯訓練的管理與技術人員，並非完全被排除。

毛澤東時代反對過黑魯曉夫「土豆燒牛肉」式的社會主義，對蘇聯下放計劃權力，依利潤發給獎金，對工人實施物質鼓勵等等的經濟改革，斥責爲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在鄧小平領導的現政權之下，中共也像過去將蘇聯的制度照抄照搬，提出過檢討。然而，中共所實行的基本上仍然是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而且它目前的所謂改革，其內容與方式，有不少也是過去蘇聯所已實行而未收效、甚至發生過流弊的。只是在對外開放政策方面，有些部門比蘇聯更大膽，其負作用也就更顯著。

這裏會使人產生這樣一些疑問：如果中央計劃式的命令經濟體制，是公有公營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構想與目的——公有財產制——下的產物，那麼這種體制是否可予以根本改變？如果體制不能澈底改弦更張，那些枝枝節節技術性的改革會否有效？又如果想在中央計劃的制度基礎上引進一些西方的經營技術，或者像中共所說「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那是否可能收效？依筆者淺見，這些答案都將是否定的。也將由此導引出另一個問題：蘇聯謹慎的、小幅度的改革是失敗了，中共比較大膽的比較大步的改革仍然要失敗，而且它已經失敗（現今已不再強調改革，而是強調調整了），那末它將要走那一條道路？西方的市場經濟道路？不可能，它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那是一條和蘇聯基本上相同的道路，因爲從一九七九年（和美國建交之年）起，中共就只指摘蘇聯對外實行霸權主義，却認同蘇聯國內仍舊奉行社會主義政策。如今中共反蘇，乃是反「霸」而不是反「修」了。

中共現有蘇製生產設備不能全部丟棄不用，其蘇式工業體系及管理結構，不光在短期內、就是在很長的時間裏也無法改換成西方模式。

五

蘇聯給予中共的援助^⑤，談不上慷慨，還不足以抵補第二次大戰後蘇聯從中國東北以戰利品名義掠奪走的工業設備與生產物

註⑤ 請參閱拙作「關於蘇聯對中共的經技援助問題」，本刊第廿一卷，第十期。

資的價值^⑥。然而，我們很難想像會有另外一個國家願意而且能够給像北平那樣一個貧困、貪婪、不穩、善變的共黨政權以與蘇聯所給的相同或更大數額的援助。因為它們會考慮蘇聯與中共意識形態相同、最後目標一致，給予它如許的援助，尚且不能阻止北平翻臉，其他國家又豈能輕易冒險嘗試？

中共確是正向西方尋求援助，雖然它把那些國家仍然當作「未來的敵人」。不過，中共的另外一些動態，也頗值得我們注意。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共與美國建交，二月十七日出兵「教訓」越南，四月間通知蘇聯不延長雙方的同盟條約，那使得北平和莫斯科的關係空前緊張。「教訓」越南就是打擊蘇聯，那是一場正規戰爭，與中共和蘇聯一九六九年三月的珍寶島衝突、八月間的裕民縣事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一九六九年的武裝衝突後，雙方三十年友好同盟條約依然存在，一九七九年中共和越南戰爭後，該條約已將屆滿期，中共即通知蘇聯廢約，一九八〇年雙方就處於無條約狀態，照理說雙方關係已惡化到高峯。可是，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劉平，隨同中共對外貿易代表團赴蘇參加貿易談判，八月十三日返平，他曾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講話，對蘇聯情況作了一次簡介。九月間中共「中國全國蘇聯文學研究會」在哈爾濱召開「全國第二次現代蘇聯文學討論會」，會議紀要中談到蘇聯社會制度等問題。同年底在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發行的「百家文藝」雜誌，發表以「關於布里茲涅夫時期文藝政策的若干情況和看法」為題的論文。又曾任中共駐莫斯科「大使」、回平後轉任「外交部」副部長再赴蘇以首席代表身分參加雙方改善關係談判的王幼平，返回大陸後在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講話，他也談到蘇聯問題，經香港「廣角鏡」雜誌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六日揭載。綜合該等文件，可歸納其主要觀點與有關事實如下：(一)布里茲涅夫時期，蘇聯政局比較穩定，經濟有重大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提高；(二)中共仍購買蘇製飛機、汽車、有色金屬、能源及燃料有關成套設備等，中共熱愛蘇製「傻、大、粗」，而耐用的東西（或許因為蘇聯式技術較低級的東西，比較西方現代化高級技術的東西更容易為中共所接受——筆者）；(三)蘇聯幹部特權不如外傳之甚，內政方面，蘇聯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則實行侵略、擴張政策，推行霸權主義，中共應將蘇聯的內政、外交分別對待；(四)蘇聯人民包括幹部都不願意同中共打仗，蘇聯人民對中共的一項宣傳最為反感，那就是說蘇聯是中共的「頭號敵人」；(五)蘇聯學術界在公開爭論中共是什麼國家，和中共學術界爭論蘇聯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他們基本上有四種意見：甲、(中共)是社會主義，(中蘇)兩黨分裂是暫時的；乙、上層建築變了，經濟基礎未變（「文革」除外）；丙、粉碎「四人幫」後，起了積極的變化，蘇聯應主動搞好關係；丁、雖是積極變化，但還是反蘇，只是這一

註⑥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關於我東北工業狀況的調查報告中說：「估計該地於俄軍佔領期內，工業上的直接損失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如果計算工業設備的複置費用和品質的變壞損失額，應為二十億美元」。轉自 蔣總統著《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七年二月，第廿九版），一七五頁。

條不變，還是「文革」時期的樣子。(4)在蘇聯，中共事務仍歸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想係社會主義國家共黨部——筆者）主管，該部副部長認為中共是社會主義國家，該部要管到底。

一九八〇年四月廿三日日本時報（Japan Times）在一項分析中指出，中共和蘇聯正努力尋求有限度和解。文中提及中共一個專家代表團赴莫斯科商談貿易協定，歸來後報告說，蘇式極端中央集權化的經濟規劃效果非常良好。此一報告被反對者用以反對鄧小平四個現代化所使用的中央計劃與地方自主混合的戰略。有有限度改變對蘇關係，是鄧小平對此一批評加以容忍的表現。

我們不知道該報所指的是否劉平的報告，但劉平報告的結尾處說：「從蘇聯國內來看，是兩種公有制加自留地，與我們一樣。對蘇聯成功、失敗的教訓都要研究，研究蘇聯比研究資本主義國家有價值，資本主義畢竟是私人占有。爲什麼不可以研究蘇聯呢？要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最後一句話：蘇聯這一禁區要打破」！

就事實言，近年來中共和蘇聯之間，人員往來頗爲頻繁，除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長卡比察（Mikhail Kapitsa）於一九八〇、八二年兩度訪平，蘇聯外交學院院長、「蘇中友好協會」第一副會長齊赫文斯基（S. Tikhvinskiy）於一九八二年訪平外，雙方體育界及其他方面人士亦時有往還。一九八一年六月，蘇聯科學院兩位學者應中共東北地方之邀，前往該地區考察約四十天^⑤。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三位經濟學家劉錫元、劉桂括、鍾莉赴莫斯科，由中共「大使」楊守正陪同訪問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巴秋林（Alexander Bachurin）等多次晤談，內容當與經濟企業的計劃管理等有關^⑥。中共最近已接納蘇聯學生到中國大陸留學，且邀請一些蘇聯技術專家到大陸各工廠去視察，並提出修理與改善的建議^⑦。而較早時即一九八二年二月中旬中共與蘇聯簽訂「中蘇鐵道貨物運輸協定」，確認中共與歐洲國家將可以共同使用西伯利亞鐵道運輸貨物，中共對之曾大事渲染，其意義就不很尋常。據悉對於鄧小平的經濟路線，內部反對者頗不乏人，而且此一路線，目前不僅遭遇挫折，且已產生不少嚴重的副作用。果如此，則內部反對勢力抬頭，重返蘇聯經濟模式的可能性極大。

蘇聯有數的中共問題專家、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克里福佐夫（V. A. Krivtsov）認爲：中共正在摸索發展社會經濟的模式，其歸趨如何，關係到內部的權力鬭爭。他指出中共未來發展形態有三種可能：（一）鄧小平強制執行的形態，也就是右傾社會主義模式；（二）「文革」派重掌權力，某種程度的恢復毛澤東模式；（三）重返一九五〇年代的科學社會主義（按指蘇聯模式——筆者）。他認爲第三種可能性最大。克里福佐夫仍然承認中共是社會主義國家。他指出鄧小平要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亦即計劃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社會主義各種要素相結合，但今年初陳雲已經強調計劃經濟爲主、市場經濟爲輔，那顯示計劃因素佔有優位，

註⑦ 日本〔朝日新聞〕夕刊「深海流」欄（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第三面。

註⑧ 「如何看布里茲涅夫建議的眞意」，〔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社論。

註⑨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第五面。

中共已從經驗中獲知市場社會主義困難多多，最重要的還是一九五〇年代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⑳。另據「美聯社」發自北平的報導稱，中共消息來源透露，中共高級經濟和研究所蘇聯問題的專家們，在一項加緊研究蘇聯體制的工作會議中，絕大多數支持蘇聯中央計劃的經濟模式，而捨棄較能反映市場因素的南斯拉夫模式（即所謂市場社會主義——筆者）^㉑。

撇開意識形態不談，中共在經濟方面無法割斷與蘇聯的關係，體制上也終將重返蘇聯經濟模式的老路。那是共產經濟之本質使然，不是局外人憑任何動機、找任何藉口、以任何手段所可阻撓或改變的。

註^⑳ 「中共是可變的」，日本〔產經新聞〕（下）（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第三面。
註^㉑ 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為「農村變亂（一）——查田運動」，第五冊為「農村變亂（二）——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為「農村變亂（三）——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鬭爭等」。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七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臺幣四十二元
國外：平寄美金 十五元
航空美金 六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